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 文獻叢刊

萬斯同全集

1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本書出版得到鄞州區地方文獻整理委員會經費資助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萬斯同全集

1

方祖猷 主編

寧波出版社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眾見，決定啟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為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眾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為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為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昇為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一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

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眾，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羣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眾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陵，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度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度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

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倭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倭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序

方祖猷

萬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卒後門人私謚貞文。浙江鄞縣（今寧波市）人。生於明崇禎十一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一年，年六十五。萬氏爲甬上望族，先祖四世死於國事，鄞人稱作『萬氏三世四忠』。高祖萬表，武將兼名儒，爲王守仁浙中弟子。父萬泰，棄武從文，爲復社名士，明末著名思想家劉宗周學生，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羲的同窗好友，他自己又是甬上著名的明遺民。家風和庭訓，對萬斯同思想具有深刻的影響。

一

萬斯同一生，約可分爲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崇禎十一年到康熙五年（一六三八—一六六六），這是他的童年、青少年和參加文會時期。九歲時，清軍渡錢塘江，席捲浙東，萬泰率全家避兵於奉化榆林，從此開始了長達三年的逃難時期。他也從一位貴公子急劇下降爲一名『荷鋤』的『田舍兒』，因而體驗了民間疾苦。萬泰在順治十四年病卒。康熙元年，城內故居又爲清將所奪，萬氏兄弟七人被逼移居甬城西郊墓舍，生活十分潦倒。其間，他先在城內參加了文會，後在城西加入澹園社，並與其中的一些人共同組織『策論之會』，在學問上互相切磋，這時他的志願是欲以古文辭詩歌名世。順治十六年、十八年，他兩次到餘姚化安山拜謁黃宗羲，在黃氏指導下，萬斯同開始從事經史之學。

第二個時期，從康熙六年到康熙十七年（一六六七—一六七八），是他參加甬上證人書院和設館授徒時期。康熙六年，他與策論成員共二十六人，往餘姚受業於黃宗羲。同年五月，黃宗羲來甬，講授『戴山之學』，於是策論會改爲證人之會，後又稱五經會或講經會。次年，黃宗羲再次來甬，正式創辦甬上證人書院。證人書院共開辦八年時間，是清初浙東學派的開創基地。在這段時期，萬斯同既參加證人書院學習，又先後在紹興和寧波設館授徒。康熙十七年，他到崑山，在徐乾學、徐元文兄弟家中爲他們編撰喪禮。這時，他已從爲古文詞詩歌轉爲考察古今制度再變爲專治明史，他一生爲學三變，至此完成。他的史學思想基本成熟，史法也初步形成。

第三個時期，從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八年（一六七九—一六八九），是他北上修史的前期。康熙十八年，他因徐乾學兄弟推薦，與侄萬言同到京都編修明史，任『刊修』之職，『隱操總裁之柄』。錢林文獻徵存錄卷一斯同。但他既不置銜，不受俸，也不住史局。京師是才彥雲集之地，他認識了閻若璩、陸隴其、胡渭、劉獻廷、王源等著名學者，在學術上互相討論，有時甚至爭辯激烈，促進了他學術思想的發展。由於他淵博的明史知識，獲得在京的達官貴人和學者們的尊敬。但他對史局修史的情況很不滿意，因為在他之上有總裁和監修，不能實現他來京修史的『藉手以報先朝』石園文集卷首楊无咎萬季野先生墓志銘的初衷。於是，他開始與劉獻廷秘密合作，共同抄寫史館『秘書』，準備將來離開史局，私修明史。

第四個時期，從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至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他在京都猝然逝世止。康熙二十九年，徐乾學、徐元文兄弟相繼致仕回籍。他與劉獻廷為離開史局開始行動，劉獻廷先帶他們所抄的『秘書』回江南，而萬斯同卻被新的明史監修和總裁所堅留，未能成行。這一年，他還應證人書院學友仇兆鰲邀請，在京師開講座，主講經史之學，一直到他逝世前，很少停止過。四年後，劉獻廷不幸在吳去世，他們所抄的書籍全部散失，對他的打擊極大。思想上的苦悶，他曾多次在鷄鳴風雨之日，向好友劉坊訴說。這段時期，他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找尋修史的知心助手。他向年輕的方苞暢談史法，希望與他合作修史書，但方苞婉辭了。他勉勵他的學生溫睿臨寫南明的歷史。他終於找到了知心好友，這就是李塉，但李塉無意修史，他自己卻受李塉的影響，從早期的蕺山之學，經潘平格的求仁之學，轉而接受了顏李學派的思想，也可以說他的哲學思想在晚年為之三變。康熙三十七年，他第二次回寧波老家，在餘姚的黃百家家里，看到了黃宗羲的遺著明三史鈔，他大喜過望，與黃百家約好，待修史完成回來後，共同合著明朝大事記，可惜的是，志未酬，身先死，康熙四十一年猝然在王鴻緒的館邸里逝世。這時明史稿已完成了紀、傳四百十六卷，一說四百六十卷。並私撰南明弘光、監國、隆武、永歷四朝傳記。未完。

二

萬斯同，在清代以經史著名，民國以後，則以史學鳴世。這裡就他的史學思想作一簡要分析。他的史學思想，主要表現在下列幾點：

（一）闡揚民族思想，提倡民族氣節。萬斯同的民族思想有其發展過程。在清兵征服全國的過程中，由於實行屠城、洗

山、禁海的殘酷屠殺政策，他早期有顯著的反清意識。他在述舊詩中以赤日比喻明朝，以腥塵比喻清軍。在與從子貞一書裏還寄希望於清朝的垮臺，說：『天而有意於生民必當大變。』『石園文集卷七。』

順康之交，抗清鬥爭全面失敗。三藩之亂平定後，清廷統治出現了相對穩定的局面，對漢知識分子採取了既打擊又利用的政策。在承認清廷統治的情況下，萬斯同與劉獻廷、黃百家相約，企圖私修明史，鼓勵溫睿臨撰寫南明歷史，以實現上述意圖。他著明末諸傳、溫睿臨南疆逸史凡例。兩浙忠義考，僅寫成提綱。宣揚『名節立身』，書宋史王應麟傳後。輯宋季忠義錄，撰南宋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以激發明亡之痛。他在新樂府詞中多次寫道：『今之仕宦皆爭巧，飲人膏血猶未飽。』『埋羹守。』暗示昔明因腐敗而亡，現在的清朝將來定亦如此。萬斯同宣傳忠、節、義等，這在清初統治者採取民族屠殺和民族高壓政策的情況下，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

(二)反對封建君主專制。萬斯同修明史是爲了『藉手以報先朝』，楊无咎萬季野先生墓志銘。但目的絕非歌頌故君，效忠於朱明的一姓一家，而是爲了總結明亡教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的正統觀念。他在樂府新詞中對有明歷朝皇帝個個予以抨擊，他揭露明太祖、明成祖的殘暴，諷刺明武宗、神宗、熹宗等的荒淫和昏庸。只有明孝宗才像樣一些，然而，就在世宗朝，『豈知世風之不振，至於如此！』『石園文集卷五書倪文毅傳後。』所以萬斯同不是對個別君主進行抨擊，而己不自覺地涉及君主專制制度本身。

萬斯同認爲，由於君主的殘暴與昏庸，造成了明朝政治的腐敗，如『兵戎大政由宦官』『新樂府詞下麓川。』的宦官專政；『重徵加派擾海內』『同上書遼東餉。』的橫徵暴斂；『官兵如鳥倭如鷗』『同上書倭無敵。』的武備廢弛；『得賄三舉觴』『石園文集卷五讀劉字傳。』的賄賂公行。這些，都是明朝覆亡的原因。

那麼，應從中獲取什麼教訓呢？他認爲，要改革腐敗的政治，必須做到兩點：一是君主必須善於訥諫，使『人人得以盡言』，所以他反對『羣工百職掛口而不敢言』『同上書讀弘治實錄。』的專制統治，提倡『天下之公論』，『同上書讀席書傳。』二是君主必須善於用人，不但要擇賢，而且要『君臣相得信任』，否則如世宗朝那樣，君臣不和，『遂致南北大亂，生民塗炭』。『同上書書楊文忠傳後。』萬斯同主張清議，以君臣相互信任來代替臣下對君主的絕對服從，這在明清時期，含有限制君權的意味。

(三)人民性。萬斯同由於近三十年居於下層，熟知民間疾苦，反映在史學思想上，他同情歷史上老百姓的悲苦生活，他把統治者的窮奢極欲與老百姓的憔悴艱辛相對比，說：『何況爲官求食肉，不顧民間有菜色，民有菜色官不知，官有肉味民

豈識。『樂府新詞青菜王。他指出重賦是明亡的重要原因，『豈知斂財更斂怨，從此萬方遂土崩』，同上書遼東餉。『民之苦賦，甚於苦賊』。石園文集卷五書陸給事王御史劾胡宗憲二疏。在萬季野先生四明講義中，記錄他列訴明末的六次加徵，說：『自古加賦無如此之重者，至明而極重，生民之困極矣，國欲不亡得乎？』因此，萬斯同對農民起義予以一定同情，在樂府新詞納闖王中，根據當時民謠，有感而發，寫出如下詩句：『闖王來，城門開，闖王不來誰將衣食與吾儕？寒不得衣飢不食，還把錢糧日夜催。更有貪官來剝肉，生填溝壑誠可哀。欲得須臾緩我死，不待闖王更待誰？闖王來兮我心悅，闖王不來我心悲。』這完全是當時的實錄，寫得何等大膽！

他對明末農民起義的這種認識，提高到『盜亦有道』的理性高度。明武宗時，農民起義首領趙風子破城索奸相焦芳不得，斬其衣冠於樹下，說：『吾為天下誅此賊！』萬斯同得出如下感想：『噫嘻！盜亦有道誠非誣，誅奸戮佞真丈夫。若使此人居殿陛，臣奸豈得保殘軀。嘆息朝堂論功罪，不及草間一賊徒。』樂府新詞戮奸相。這簡直對農民起義近於謳歌了。用這樣的感情來寫農民起義，在歷史上是極少見的。當然，這並不是說萬斯同成了農民起義的喉舌，因為他把農民起義領袖看作『兇渠』、『狂徒』、『賊』，樂府新詞九官山。從本質上說是反對農民起義的。他認為應從中吸取教訓：『寄語有司各守職，慎勿逼民為盜賊。』同上書納闖王。說明他是從官逼民反的角度來同情農民起義的。

在對農民起義的態度上，萬斯同曾與王源發生分歧，萬斯同斥責廖永忠秉朱元璋意旨沉元末紅巾軍首領韓林兒於瓜步，說他『弑主甘為賊』，因為朱元璋曾受命於韓林兒。王源大為不滿，罵韓林兒是『賊子牧豎』，居業堂文集卷六與友人論韓林兒書。說萬斯同將來在地下無以見其祖先。兩相對比，說明萬斯同的觀點在當時修史諸公中，確是首屈一指了。

三

關於萬斯同的史法，康熙三十五年在他與方苞的一次長談中，作了專門的敘述，這是他長期治史的經驗總結。指出了『事信而言文』的原則，其主要精神有下列五點：

（一）要做到『事信』，必須博搜史料而以實錄為指歸。因為『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為什麼要博搜資料呢？他說：『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所以他的方法是：『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

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所引皆見方苞集卷十二萬季野墓表。』

然而他並不盲目相信實錄，這在他關於明史史論中多次談及。如讀弘治實錄中，他明白指出：『有明之實錄，未有若弘治之顛倒者也』，因為實錄是由執筆者書寫的，與執筆者的政治傾向和個人品德有密切關係。

(二)所以，要做到『事信』，必須發揮中國歷史上優秀的『直筆』精神，這在修明史時更屬必需。他說：『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事跡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同上書。因而，他反對『隨人曲筆』。讀弘治實錄。也反對褒貶由己的偏見，『好之則過於褒，惡之則過於貶』。石園文集卷五書梁文康傳後。最後，他反對為尊者諱，對洪武實錄掩飾明太祖殺戮之慘和受命於韓宋事，頗不以為然，說：『縱曰為國諱，惡顧得為信史乎？』石園文集卷五讀洪武實錄。

(三)要做到『事信』，還必須要有史識。他說，現在事之信所以尤難，還在於『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萬季野墓表。他研究中國古代史，提倡獨斷，反對墨守盲從，他說：『事而真，即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真，即百十人亦可疑，此論真偽，不論衆寡也。』石園文集卷六石鼓文辨一。

(四)反對官局修史。斯同認為，官局修史，由於兩種原因，就會造成史實失真，第一，『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萬季野墓表。叫外行人來辦，一定會發生錯亂。然而，主要還在於第二點，他說：『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跡，暗昧而不明。』同上書。憑各人好惡來寫，史籍就會失真。

其實，還有一點原因，他說不出口。官局修史，必須受制於監修，受制於總裁，乃至受制於帝王。清廷修明史，是為了拉攏漢知識分子，以緩和滿漢民族矛盾，然其首要原則是必須有利於統治，康熙帝確也多次過問修史情況。莊廷鑑案為時不遠，種種忌諱他豈不知道？所以，他所說的『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跡暗昧而不明』的，更重要的原因不在於分修衆人，而在於君主的干預。這是萬斯同幾次想辭史局的原因。

(五)提倡『言文』。萬斯同說：『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同上書。他早年給李文胤書，動員他共修郡志，就因為李文胤文章寫得好，希望家鄉在明清之際的忠烈事跡，能『借先生之文以傳』。石園文集卷七與李杲堂先生書。

萬斯同在與方苞的談話中，有一點與此似有矛盾，他說：『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不可益也。』這豈非與

『言文』抵牾！其實，他又有難言之隱在。鑒於莊廷鑑案中，民間所藏有明一代大批史料被毀，斯同希望通過官修明史，『先爲之極』，用合法手段來保存大批明季的真實史料。這與顧炎武多次主張在修明史中，應對『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亭林文集卷四與次耕書。有相似之意。

萬斯同的史法，除他自述這五點外，還有兩點爲他人所稱道。一是他的考證方法。他於歷代的典章制度、古代山脈、河渠，皆能『穴穿古書，參稽異同』，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十四史部地理類二崑崙河源考。人們往往稱他『工於考證』。同上書。二是會通的方法。斯同治史，善於綜會諸家尋求源流。他說自己研究歷代典章制度，『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與從子貞一書。所著儒林宗派，不僅記載自孔子至明末的諸儒學統，而且綜會百家，既無朱陸門戶之見，且旁及老、墨、申、韓，與傅山一起，開了清初研究諸子的風氣。他的四明講義，正是探求典章制度的源流，而總結其教訓，斟酌其確當的典型的史學經世之作。

對於萬斯同的史法，王源的評價很高，說他具有史才、史學和史識，說：『此萬子之學所爲不可及也』。居業堂文集卷十二萬季野補晉書五表序。

四

萬斯同的史學，受黃宗羲的影響很深，黃宗羲在康熙二年修改他具有強烈民族思想的留書，補充擴大寫成具有強烈反君主專制思想的明夷待訪錄，這件事萬斯同的五兄斯選是預聞其事的，黃宗羲在留書的題辭中說：『癸巳秋爲書一卷，留之篋中，後十年續有明夷待訪錄之作，則其大者多採入焉。而其餘棄之甬上，萬公擇謂尚有可取者，乃復附之明夷待訪錄之後，是非予之所留也，公擇之所留也。』伏跗室藏南雷黃子留書。後來，萬斯同的姪子萬言還帶此書北上，顧炎武曾在萬言處看到了這本書，說明黃宗羲這兩本『佐王之略』的著作，萬斯同的兄長和侄子都看過，斯同自然不會例外。他在樂府新詞中一一抨擊有明君主的殘暴和荒淫，聯繫明夷待訪錄原君說的，君主如明太祖、明成祖。在未得天下時，『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得天下後，如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則『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明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則『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淫樂』。師生之間思想上的共同之處，是十分明顯的，不過老師見之於政論，學生見之於史事而已。

黃宗羲認爲，『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經世』是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史學的一個重要特色。萬斯同自稱，他研究自有書契以來的古代典章制度，『無弗考索遺意，論其可行不可行』，劉坊萬季

野先生行狀。是古爲今用。他治史既然是從經世出發，重點自然放在當代，而把畢生精力用於編寫明史上。

黃宗羲提倡『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之湛思』〔南雷文定前集六〕陸文虎先生墓誌銘。的理性主義方法，他在寧波證人書院就是用這種方法教學的。斯同提倡博取、會通、考證等的治史方法，是在寧波證人書院受業時受黃宗羲影響的結果。我在萬斯同評傳的結束語一章中，將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和萬斯同言論作了對照，舉出十二個具體例子，說明萬氏史學中有關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思想與黃宗羲基本一致。

萬斯同吸取了黃宗羲的史學而發揮之，黃、萬之學，已經形成了民族民主思想和經世致用的史學精神；重在現代的史學內容；深思、博取、考證等的史學方法：這是浙東史學的三大特色。

萬斯同史學不但近取黃宗羲，而且遠紹我國古代史學上的優秀傳統。他把明太祖受命於韓宋與史漢的劉邦受命於懷王相比；他對農民起義的同情，與司馬遷把陳勝列入世家這種史學上的人民性是一脈相承的。李文胤在論他的史法時，還以司馬遷的『深思』、『深考』〔杲堂文鈔卷一〕歷代史表序。與之相比擬。萬斯同在儒林宗派中，以儒家爲主，旁及老、墨、申、韓，這是班固漢書藝文志和劉向、劉歆父子以六藝冠九流，不罷黜百家精神的繼續。馬叙倫先生就說：『石園先生猶拾班志之成規，通向、歆之遺意與？』〔儒林宗派後序〕。劉知幾反對史館監修，主張『採摭羣言』，提倡『直書』，反對『曲筆』和『諱飾』，主張『史而載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等等，皆見史通。顯然影響了萬斯同『事信而言文』的主張。

萬斯同的史學，其後爲全祖望和章學誠所繼承，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黃宗羲是浙東史學的開創者，那麼萬斯同和全祖望是奠基者，而章學誠是這一派史學理論的集大成者。

黃宗羲、萬斯同所創導的『漢儒博物考古之功』的方法，對以後的乾嘉史學亦有一定的影響。以徐乾學名義，實則主要由斯同撰寫的讀禮通考一書的徐樹穀序中，闡述此書運用的考證方法：『經可信，不敢捨經而從傳；傳可信，不敢捨傳而從各家。然亦有經不足而不得不取之於傳；傳不足而取之注疏論辨者。』〔讀禮通考卷首徐樹穀序〕。這一方法，以後爲乾嘉學派所奉行。萬斯同重視史表，著補歷代史表、儒林宗派、歷代紀元彙考等，開啓了後來被梁啟超譽爲『清儒絕詣而成績永不可沒』〔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總成績三。的乾嘉時期蔚爲大觀的撰寫各種史表的一代風氣。然而，乾嘉史學在清廷文化高壓政策下，走上了基本上以考證方法治史的偏狹道路，拋棄了黃、萬、全等人的治史精神。梁啟超說，黃宗羲、萬斯同、章學誠『三君子之學不盛行於清代，清代史學界之恥也』，同上書。他的評價是基本正確的。

對萬斯同的學術，在他生前就有不同的評價，如對他的詩作，他的甬上同學鄭梁嫌其弱，而李文胤卻認為視唐之元、白，明之楊、李，則幾過之；對他的經學，毛奇齡、閻若璩與之作過辯論；對他的史學，王源不同意他對韓林兒的看法；對他的哲學上傾向潘平格，黃宗羲曾予以嚴厲的批評。至於在他卒後，爭論就更多，概括起來有如下幾種：

在經學上，有他是否是一位純粹的考據學家及其考據有否成績的問題；讀禮通考和五禮通考是否為他所作問題；他的石經考一書的評價問題。在史學上，有關於他的史識問題；萬氏明史稿和王鴻緒明史稿的優劣問題；王鴻緒有否篡竊萬氏明史稿問題；關於萬斯同所重視的史表體裁的評價問題，以及他有否主張建文帝遜國出亡的問題。此外，在哲學上尚有他辟宋儒，儒林宗派收有申、韓、老、莊及反對宋史區分道學傳和儒林傳是否妥當的問題；在文學上有對他的文筆優劣的評價問題。上述種種問題，有許多牽涉到萬斯同的民族思想，他的經世觀點和經學研究在整個明清之際學術史上的歷史地位，即他在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和過渡到以後乾嘉漢學過程中的作用這一總評價問題。

上述問題，有的已解決，有的歷幾百年而尚未有定論。一九九一年，訓慈先師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萬斯同年譜時，我在序中已提出了這些問題，離現在已整整二十多年了。此後，我們當時尚未發現的萬氏著作也陸續走出深閨。因此，我決心將目前已發現的萬氏著作，彙編成全集出版，為學者研究萬氏思想提供全面的資料，使上述未解決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或引起新問題的討論。這應該是訓慈先師和我這一輩人應盡的責任。先師在世時，常以不得目睹萬氏好些著作為恨，望我能在他的基礎上賡續完成。現在此書出版了，我可以告慰先師在天之靈，並希望後起者能繼續發掘萬氏已佚著作，而使全集更為完整。萬氏遺著整理頗難，我們水平有限，望廣大讀者能予指正。

凡例

- 一、全集共收萬斯同著作二十三種。
- 二、在正文後設附錄一欄，以收有關萬斯同的序、師友尺牘、師友唱和、佚事拾零、傳記、著作存佚、考證、題記和萬斯同佚書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研究萬氏學術思想的論文，數量多而且篇幅大，故不錄。
- 三、全集著作有稿本、鈔本、印刷本三類，除明史列傳稿屬稿本需保持原貌影印外，其他皆點校出版。
- 四、凡各書之間有重複的篇章，按書之完整性原則，稍作刪併。如羣書疑辨實爲萬氏著作中之選本，選自石園文集、廟制圖考、崑崙河源考、石經考、南宋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等諸書。本書對原本作適當刪削，使之保留其基本原貌，又使疑辨得以成書。又如萬季野先生四明講義與講經口授實屬同一記錄稿，然所記章節各有存缺，內容亦詳略有異，本書以前者爲底本補其所缺，合爲一書。凡此種刪削或互補，都在各自點校說明或在校記中注明。
- 五、爲便於閱讀，在各著作前置點校說明。無目錄者，則補之。
- 六、對原書不同版本，擇其重要者爲底本，而以他本對校。然有多種版本，而各版本內容皆有所缺，則採取多種版本互補互校，使之完整。凡涉及萬氏引用前人書籍而又便於查閱者，則他校，各出校記以說明。
- 七、凡異體字、古體字、俗體字、通假字，除個別外，按原書不予改動。避諱字，或顯然誤刻者，則逕改，不出校記。
- 八、個別稿本、鈔本有錯頁者，則整理訂正之；因年久字跡不清者，則據他書補之；如原文殘缺無法補者，則以□表示之，因各種原由無法辨識者，以■表示之。

萬斯同全集總目

第一冊

總序

序

凡例

周正彙考

石經考

廟制圖考

崑崙河源考

宋季忠義錄

南宋六陵遺事

庚申君遺事

簪纓盛事錄

兩浙名賢錄

明季兩浙忠義考

第二冊

補歷代史表

萬斯同全集 第一冊

第三冊

補歷代史表

第四冊

補歷代史表

第五冊

歷代紀元匯考

儒林宗派

歷代宰輔匯考

萬季野先生四明講義

明代河渠考

天下志地

第六冊

明史列傳稿

第七冊

明史列傳稿

第八冊

書學彙編